

经济学知识体系演变与 中国经济学自主建构

——基于实证、规范与实践的学科史考察

王 欢

摘要:从学科史来看,经济学不是由纯理论构成的封闭知识系统,而是兼具机制解释、价值判断与治理实践的复合型知识形态。借助经济哲学的元科学视角,以“实证—规范—实践”三分法为分析框架,考查经济学知识体系在西方和中国不同历史语境中的生成与演变。研究发现,古典经济学及相关传统原本兼具实证、规范与实践三重维度,而新古典经济学在形式化与建制化扩张中逐步淡化了规范与实践维度。中国经济学长期经历对外来经济学说的引进、吸收与改造,新时代以来进一步转向自主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建构的关键,在于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问题结构,重新组织实证、规范与实践的关系,形成能够同时回应机制解释、价值判断与治理实践的知识体系。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国式现代化;学科史;经济哲学;实证—规范—实践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26)06-018-13

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围绕“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1]14},再次突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在创新理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并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1]37}。在2026年3月正式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中,进一步提出“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2]96}。

对于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2026年既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恰逢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发表10周年。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3]2-15}在新的历史坐标下,如何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将理论创新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当前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所必须正视的时代课题。

收稿日期:2026-04-13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启计划”(2025QQJH49)

作者简介:王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就经济学而言,其根本任务是为经济社会秩序的运行提供解释与预测,其知识体系的生成与演变也因此嵌入社会的结构演化与制度变迁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开辟了一条具有原创性与独特性的现代化道路,其制度复杂性与历史连续性明显不同于西方的工业化路径。^{[4][5]}《建议》强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6]特殊的历史条件与制度环境,决定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关键,不在于引进、吸收和改造外来经济学说及其分析范式,而在于形成能够同时回应机制解释、价值判断与治理实践的自主知识结构。

围绕这一重要课题,在借鉴国内学者从知识论、方法论、历史基础等方面出发所作的诸多有益探索的基础上,^[7-9]本文拟从学科史视角出发,结合经济哲学的问题意识与分析框架,进一步推进对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讨论。一方面,将经济学理解为一种随着现代社会秩序发展而不断演变的知识形态。它不仅关乎对经济运行机制的解释与预测,也关乎发展目标与政策正当性的价值判断,并最终落实为可操作的治理方案与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借鉴约翰·内维尔·凯恩斯(John Neville Keynes)在经济学元科学层面的“三分法”,通过该框架来观察和总结经济学知识体系在中西方不同历史语境中的演化机制。本文旨在揭示经济学如何嵌入特定的社会结构与制度逻辑,又如何在回应理论创新和现实需要的过程中协调实证、规范与实践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应当如何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说明本文借鉴的经济哲学视角,并阐明分析框架;第三部分回到西方经济学史脉络,讨论古典经济学的知识结构,以及历史学派、制度学派等非主流传统提供的另一种路径;第四部分转向新古典经济学,分析它如何在确立与扩张过程中走向形式化,并借助学术建制获得主导地位;第五部分以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为界,梳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现代化历程中,从“引进—吸收—改造”到自主建构的演进过程;结论部分集中讨论“实证—规范—实践”三维框架对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指引与实践启示。

二、经济哲学分析框架

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及其生成机制可以从理论、实践、历史等不同角度去理解,其中经济哲学所提供的元科学视角亦不可或缺。经济哲学以经济学本身为研究对象,聚焦其性质、范围、意义和方法等问题。经济哲学关注经济学的社会属性和历史属性,强调其所处理的并不只是物质生产与资源配置的技术问题,还涉及制度建构、社会组织以及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适。因此,讨论经济学知识体系如何生成并发生范式更替,不能只停留在“模型是否精致”“推导是否严密”等层面,还必须追问经济学以什么为研究对象、以何种标准界定科学性与正当性,以及如何同制度安排与治理实践相联系。

在学术史上,经济学诞生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的标志性事件之一,^[10]¹⁷其发展也始终伴随着现代社会结构与制度形态的深刻变迁。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到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再到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政治经济学在理论上持续回应着商业社会兴起、工业革命爆发以来经济社会秩序的重构,尤其聚焦于自由市场秩序的形成、财富生产与分配机制的确立,以及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等关键议题。经济学自诞生之初起,就是一种围绕现代社会秩序与制度安排而展开的知识实践;然而自19世纪末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发展中逐渐淡化了其原本的制度关切、

历史观照与人文关怀,转而构建了以理性、均衡、最优化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11]

该范式通过效仿自然科学,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学的“科学化”趋势,但也因此牺牲了其对现实的洞察力与解释力,并在经济哲学层面招致诸多批判。首先,新古典范式过度依赖抽象模型,不但严重脱离现实,也很难为社会变迁与重大事件提供前瞻预测与充分解释;^[12-14]其次,新古典范式在面对现实批评与挑战时缺乏实质性调整,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知识与制度的共同演化,导致自身知识结构日益僵化封闭;^{[15][16]}最后,类自然科学的强实证主义框架不适用于经济学,使用抽象模型代替社会机制的因果解释的方法论基础也并不可靠。^[17-19]

当形式化被理解为经济学“唯一”的科学道路时,经济学对制度差异、历史条件、价值前提的处理方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制度与历史被外置为背景变量,规范判断被隐匿于技术选择,而知识与治理实践之间的桥梁则被简化为可计算、可操作的工具理性。反过来,这种对“超历史普遍性”与“单一规律”的追求,又导致社会科学对发展的线性理解。复杂的社会变迁与现代化转型被单纯等同于工业化、技术进步或市场机制的建立,而忽视了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社会心理等方面的深刻转型。即便某些理论提倡市场机制与民主制度,其充其量是对制度的技术性理解,未能将制度的本土性、时代性与历史性妥当地纳入分析框架。在现代化理论中,类似的简化观念就流行了很久——理论被理解为对唯一社会运行规律的把握,而且这种规律本身被理解为超历史的,甚至是非社会的。中国式现代化及其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既是对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迷思的破除,也是对“依附性”知识体系的摒弃,更是对线性发展观和技术决定论的超越。^[20]

在经济哲学的诸多分析框架中,本文借鉴约翰·内维尔·凯恩斯关于经济学的“三分法”来展开后续分析。所谓“三分法”,即将广义的经济学划分为实证科学(positive science)、规范科学(normative science)与技艺(art)三类,分别聚焦于客观的经济事实与因果关系、经济后果或经济政策的价值判断,以及经济实践的具体手段。^{[21][34,35]}之所以选择该框架,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第一,从元科学角度看,“三分法”有助于区分经济学内部经常被混同的三类问题,即关于“是什么”的机制解释、关于“应当如何”的价值判断,以及关于“如何去做”的政策与制度实践;第二,从学科史角度看,“三分法”有助于结构化地比较不同经济学传统与范式的差异,这不仅涉及理论和方法的差异,还涉及经济学内部对这三类成分的范围与关系的不同看法;第三,从知识生成角度看,“三分法”有助于全面揭示经济学科学化过程与结构,这不仅关乎理论和方法的形式化,更是在教学研究、期刊评价、科研资助、政策需求等学术建制支撑下的自我固化。

需指出,虽然“三分法”提供了有力的元分析框架,但其对“技艺”的界定容易被理解为在既定理论与既定目标下对政策工具的运用,从而将实践处理为理论之外的“应用环节”。然而,无论是在知识体系的生成,还是在现实的治理与制度运行中,实践不仅会检验既有解释,也会通过政策试验、制度创新与反馈机制不断提出新问题、塑造新概念,并反过来推动理论解释与规范判断的调整。基于此,本文在借用“三分法”进行结构化分析时,同样关注“实践”在知识生产与制度演进之间发挥的枢纽作用。

经济哲学视角的引入有助于揭示经济学对社会关切的遗漏,以及对制度与历史复杂性的忽视。要理解经济学知识体系如何生成并发生范式更替,就必须从单一的技术路线拓展到结构性的社会制度分析,包括社会发展变迁的动力机制、利益诉求及其背后的制度惯性、阶层博弈与社会心理等,进而更好把握经济学对现实的刻画方式及其对秩序安排的潜在承诺。如果社会转型主要由内在社会力量驱动,经济学理论往往具有较强的内生性与原创性;如果社会转型的动力来自外部压力,或更多出于制度引进与模仿,经济学知识体系则以“输入—适应”方式而构建;如果社会转型过程中外部影响与内部动力势均力敌,经济学知识体系则更易在吸收借鉴中孕育出本土自觉。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路径,就是从以引介与适

应为主逐步转向自主建构,反映了新时代对自主知识体系的现实需求与理论自觉。

三、古典经济学及其非主流传统

1. 古典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

自从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将经济学的性质与任务同稀缺资源的配置相挂钩以来,^[22]¹⁶ 经济学研究往往有意无意地强调科学性与技术性,忽视社会性与历史性,并用一种抽象的形式化空间消解了经济演化及其历史。然而,以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的兴起,正体现着18世纪人类理解现代社会特征与未来走向的努力。^[23]¹⁷ 随着欧洲商业活动的扩张、海外贸易与工商业的增长,过去以土地与身份为基础的封建秩序迅速被基于市场、契约、货币的商业秩序所取代。市场组织、产权制度、财税体制等制度性要素的变革,不仅深刻重塑了社会结构,也带来了新的认知挑战和理论难题。当传统的宗教权威与王权统治不足以为财富分配与社会稳定提供现代意义上的正当性,人们便开始寻找一种新的知识框架来解释经济运行与秩序维系。^[24]¹⁷⁻⁶²

古典经济学以“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为名,即表明该学科不仅关注商业社会中经济运行的规律,也关注商业社会的伦理秩序与政策实践。作为最早系统建构商业社会知识体系的经济学家,斯密设想中的经济学不只关乎国民财富的增长,还要将商业社会的运行机制、伦理秩序与制度保障贯通起来,建立其关心的“自然自由体系”。在对商业社会“财富创造与分配”过程的解释中,斯密强调市场秩序的自我调节及其生成逻辑;在对商业社会“秩序与信任”何以可能的论证中,他转向社会心理与伦理基础,提出以“同情共感”为核心的道德秩序;在对规范秩序与强制手段如何落地的讨论中,他强调司法独立、公平竞争与公共财政等非市场机制对秩序维系的支撑作用。^[25] 由此可见,斯密为经济学所构想的并不只是简单化的市场机制理论,而是一套把制度、伦理与经济运行联结起来的整体性社会理论框架。这套框架同时囊括了实证、规范与实践三个维度,构成相互支撑、彼此协同的统一框架。

19世纪以来,生产效率随着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而显著提高,同时也引发了失业、贫困与不平等结构性社会问题。这一现实挑战促使古典经济学内部围绕“市场与国家”的关系产生了分化。一方面,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分析路径坚持抽象演绎方法,强调经济学作为实证科学的一面,关注市场运行的普遍法则,试图在地租、工资与利润的关系中提炼出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另一方面,以西斯蒙第(Jean Simonde de Sismondi)为代表的批判传统侧重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实践性,强调国家应在道德与制度层面对市场进行干预与调节,充分正视市场扩张可能导致的危机与失序。尽管此时古典经济学内部在价值立场、政策偏向与方法论上出现了分歧,但是围绕经济学的学科定位,他们依然共享一个基本信念,即在现代化转型引发的社会秩序的重构过程中,经济学应当发挥解释与规范的双重功能,既揭示市场运行规律,也回应制度与伦理秩序的重建。在后续的发展中,李嘉图式的理论路径最终导向边际学派与新古典经济学,而西斯蒙第的批判意识则构成激进主义经济学与制度学派的重要先声。^[26]

总的来说,作为对商业社会和市场秩序兴起的理论回应,古典经济学尝试在经济运行、伦理秩序与社会制度之间构建起一套具有变革意义和现代意识的知识体系。在古典经济学体系中,围绕着商业社会制度变迁与秩序重建的主题,实证、规范与实践三个维度相互支撑。其中,实证维度以市场扩张、组织分工、资本积累等过程为对象,侧重对经济运行的机制解释;规范维度内嵌于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定位,以繁荣、自由、公正等价值观念作为经济制度的正当性标准;实践维度则体现在贸易、税收、财政、贫困救济等经济政策方面,既提供问题来源,也以政策效果检验理论与规范。在古典经济学的知识传统中,这三者构成了逻辑闭环——实践提出问题并设定约束,实证提出针对性的因果解释,规范提供制度选择与政

策评价的尺度。

2. 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制度”传统

在学科史上,历史学派与制度学派可被视为政治经济学中重视历史脉络、制度结构与治理问题的研究传统的重要延续与发展。从时代背景来看,德国与美国在后发工业化与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持续面临贫困、劳资冲突、垄断规制与社会政策等治理压力,而这些问题却很难被自由主义经济学所设想的“普遍机制”直接解释或化解。在这一问题结构推动下,他们倾向于把经济学的对象理解为制度化的历史过程,从而区别于更强调抽象演绎、一般规律与形式化分析的经济学取向。对于该传统来说,经济运行不是可以脱离情境而自洽的“均衡模型”,而是一套在具体制度条件下展开的社会过程——法律规则如何制定、社会习俗如何运作、组织形态如何形成、权力关系如何分布,都会深刻影响交易方式、行为预期及资源配置结果。

德国历史学派强调将经济学置于国家与社会关系及制度演化的历史场域之中。作为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认为经济学是一门伦理科学。他批评自由主义经济学关于“抽象经济社会”的预设,提出如果将市场视为可脱离历史与制度条件而运作的一般机制,就会削弱对社会变迁、制度差异与国家作用的解释。在他看来,工业化造成的社会分化与冲突并不会自动被市场机制化解,秩序维系与社会整合构成了经济学无法回避的公共议题。因此,社会政策与国家治理除了是政策领域的应用以外,也构成研究议程与评价尺度的内在要求。相应地,施穆勒在实证层面强调,“经验”应当首先被理解为历史经验,经济学只有理解了道德、法律与制度的演变,才能把握经济生活的差异化路径与发展逻辑;所谓“规律”,不能再被理解为脱离历史条件的普遍公理,而更多体现为对特定历史过程的归纳性把握。^[27]概括而言,历史学派并非彻底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性,而是强调三类知识成分的统一,包括建立在历史材料之上的经济解释,以社会整合与公共目标为尺度的规范判断,以及以治理议题为问题来源并反向推动知识修正的政策实践。

美国制度学派(尤其是老制度学派)更系统地从事制度安排、规则运作与集体行动来理解经济过程。他们认为,市场是在法律、组织、习俗与权力结构下被制度化的社会过程,而非脱离社会关系形成的自发秩序。在实证层面,康芒斯(John R. Commons)主张将经济学的基本对象从商品与个体的抽象选择转向交易关系与工作规则的制度结构,同时强调交易总是在集体行动所支持的工作规则中展开。具体而言,制度是一种对个人行动加以控制、解放、扩展的集体行动,经济活动的最终单位是包含权利关系的“交易”,而非单纯的数量交换。因此,经济解释不能停留在价格机制的形式推演上,而必须进入制度规则的设定、执行与变迁机制内部。在规范层面,权利关系与工作规则本身就带有道德与法律属性,康芒斯也明确要求把经济学与法学、伦理学之间的关联纳入制度分析的前提之中。在实践层面,康芒斯特别关注制度程序如何持续处理交易中的冲突、依赖与秩序问题,以及工作规则如何随着社会力量结构的变动而调整。^[28]由此,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构建了一套系统性分析框架,它围绕“组织—工作规则—交易”的概念装置来组织解释与评价,并将规则运行的反馈纳入理论修正之中。^[29]

总之,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制度”传统并不否认理论的必要性,它只是反对脱离历史语境、先验地设定普遍规律,并直接套用于现实的研究路径。这一传统认为经济研究应该以历史材料为依据、以制度结构为中介,使理论能够适用于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并回应治理实践中的具体问题。经济学的严谨性不在于数理推导的形式,而在于能否把历史差异、制度约束与治理目标纳入同一解释框架,并在政策实践的反馈中不断校准。尽管在此后更重视形式化与标准化训练的主流学术环境中,该传统相对趋于边缘化,但其仍然为有关价值中立、形式主义革命,以及经济学与治理关系的争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史参考。

四、新古典经济学的确立及扩张

1. 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确立

19 世纪末, 边际革命成为经济学走向科学化与形式化的关键转折点。彼时, 随着欧美工业资本主义体制逐渐成熟, 产权制度、劳动力与资本市场初步确立, 市场机制在部分主流理论中被赋予了“自动调节”与“效率最优”的理性形象, 而国家、制度、历史条件等要素则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到了 20 世纪初, 随着大型企业的兴起与流水线生产方式的普及, 资本主义社会运行越来越依赖于理性化管理手段。官僚制度、标准化操作流程与管理科学的兴起, 不仅改造了企业组织与产业结构, 也深刻影响了社会科学的知识规范。

为了构建一种能够对社会秩序进行度量、预测与建模的知识体系, 以便契合工业资本主义对效率、秩序与可控性的系统性需求, 社会科学内部开始形成一种追求普遍“形式理性”的学术风潮。^[30] 在这种背景下, 门格尔(Carl Menger)、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与瓦尔拉斯(Léon Walras)等经济学家共同推动了劳动价值论向边际效用分析范式的转型, 使得“个体理性选择”与“主观效用最大化”成为经济分析的基础。由此, 经济学确立起一种以形式逻辑与数学表达为核心的科学化路径, 并通过将市场秩序抽象化为理性个体所组成的交换结构, 弱化了经济学原本的社会性与历史性特质。以边际革命为起点, 新古典经济学逐步改造了经济学的实证维度。它将个体选择、行为约束与均衡条件形式化为变量关系, 借助抽象演绎结构界定事实与因果, 而不再像古典传统那样依靠社会过程的历史叙述或制度机制来获得理论解释力。

此后, 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理论更系统地纳入个人主义方法论框架之中, 使理性选择与价格理论成为分析的核心。在实证领域, 瓦尔拉斯提出了重要的一般均衡理论, 将市场表述为一种可以演绎的形式结构, 即个体在既定约束下进行选择而产生的交换体系, 价格则承担着协调供求、传递信息并引导选择的作用。^{[31]433-450} 在规范领域, 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提出的“帕累托最优”与“帕累托改进”概念被用来处理福利评价问题, 价值判断被尽可能地收束到效率语言之中, 从而弱化了公平与正义等规范争论在经济学内部的显性地位。

经济学的形式化转向不仅提升了推导的一致性与分析工具的统一性, 也回应了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建构基本完成、市场逻辑获得制度性保障的历史背景。在带来技术收益的同时, 形式化转向也促成制度与伦理前提的外置, 使经济学逐步远离早期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伦理与社会结构的核心议题。在新古典框架中, 规范讨论越来越多地以效率语言表达, 而非直接诉诸道德哲学或制度正当性的公开辩论; 政策与治理实践则被转译为可计算的数量关系, 成为模型结论的应用场景, 而不再像古典传统那样构成问题生成与知识校准的场域。就结果而言, 经济学作为一种高度技术化的分析工具, 被广泛应用于资源配置、政策评估与福利比较, 并由此获得了更强的话语权。

形式化转向还造成社会性和历史性的淡出。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 学科名称与方法体系的转换, 反映出学科重心的转移, 制度与权力关系被更隐秘地置于理论背景之中。无论是将复杂的社会关系简化为市场与交换关系, 还是将个体设定为理性、自利且偏好稳定的“经济人”, 抑或将经济秩序建构为可由内部均衡条件自动达成的系统逻辑, 这些新古典范式的分析基础, 都依赖于工业资本主义制度稳定后所形成的特定社会结构。事实上, 市场运行的产权界限、信息机制、竞争规则、法治保障, 都早已嵌入了西方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之中, 却在理论中被简单设定为既定约束或外生常量。从方法论角度看, 这不但弱化了经济学对制度演化、历史路径依赖及权力关系的分析能力, 还进一步强化了知识体系的封

闭性。^[32]

2. 新古典范式的扩张与全球传播

在新古典经济学从一种范式取向扩张为全球范围内绝对主导的过程中,美国发挥了关键作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美国迅速确立了以私人产权、自由企业和市场竞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制度,并凭借庞大的国内市场、持续推进的工业化,以及不断增强的国际资本扩张能力,逐步取代英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伴随这一历史进程,美国不仅承接和改造了欧洲的经济传统,也在本土孕育出制度主义等富有竞争力的知识路径。更重要的是,它率先将经济学纳入研究型大学、基金会、政策机构与专业协会相互支撑的制度网络之中,推动其从强调思想性的社会科学传统转变为高度职业化、专业化和技术化的现代经济学。

在知识生产层面,经济学形式主义转向的核心不只是数学化表达本身,而是围绕“可推导—可估计—可检验”的方法标准形成了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评价规则。随着美国学术体系的成熟,经济学研究越来越强调数学表达、模型推导、统计检验与方法统一。自20世纪30年代末以来,考尔斯委员会(Cowles Commission)持续推动一般均衡理论、概率统计与计量经济学的结合,试图将经济理论建构为具有公理一致性、可估计性与可验证性的形式系统。^{[33]184-200}实证经济学被进一步重塑,经济事实被更广泛地还原为可建模、可估计并用于预测的变量关系,而经济学的科学性也越来越多地与表达的形式化程度、方法的标准化程度联系在一起。

与此同时,美国还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学术建制,用来支撑这种知识取向不断复制与扩张。以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研究型大学为中心,以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及各类基金会、政策咨询机构为支撑,经济学逐渐形成了从学术训练、成果发表到政策咨询的完整链条。^{[34]61-128}在这种制度环境中,经济学家不再以解释社会秩序和制度演化的思想家形象出现,而是被大批培养为能够提供量化分析、政策设计与技术判断的专家。新古典经济学的建制化扩张也伴随着竞争性传统的边缘化,比如制度学派关于规则、组织与集体行动的分析,就在日益强调数学训练、理论建模、工具统一的环境中边缘化了。^{[33]148-153}

不过,新古典范式的扩张并非一蹴而就,凯恩斯主义一度对其构成重要挑战,被视为20世纪经济学史上一次革命性转折。面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对自由放任信念和古典正统理论的冲击,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以《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标志,将非自愿失业、有效需求不足、流动性偏好、预期和不确定性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使经济学不再停留于市场自发均衡的静态分析,而开始系统关注宏观波动、总量失衡与国家干预等问题。^[35]在实证层面,就业、投资、利率与国民收入等宏观总量运行机制重新成为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在规范层面,充分就业、经济稳定与国家干预获得了新的理论正当性;在实践层面,经济学更加直接地服务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治理。可以说,凯恩斯主义一度重新连接起经济理论、政策目标与治理实践,并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将规范维度与实践维度边缘化的技术化倾向。

然而,凯恩斯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新古典综合”重新表述并吸纳的过程,也意味着J. M. 凯恩斯本人思想中更具批判性和革命性的部分被逐步压缩。在战后美国经济学中,经由希克斯(John Hicks)、汉森(Alvin Hansen)等人的重构,凯恩斯主义被转述为一个包含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模型,即IS-LM模型。^[36]在这一标准解释中,凯恩斯有关时间、预期、不确定性的论述被显著弱化,其核心问题被概括为短期条件下的总需求不足导致的非充分就业均衡,宏观调控则被转化为可建模、可估计、可操作的技术体系。在此基础上,“新古典综合”将这种短期宏观分析与长期新古典均衡论相结合,使凯恩斯主义不再被视为对新古典理论的根本替代,而被界定为对市场机制短期失灵的补充性修正。

因此,凯恩斯主义虽然扩展了主流经济学的议题范围,却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新古典范式中“实证—规范—实践”的关系结构。其中,形式化的实证经济学居于主导地位,规范问题被淡化为效率、福利与政策目标选择,实践则主要被理解为模型应用、参数调整与政策执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着美国国际影响力上升以及冷战格局下西方学术与政策网络的扩展,以新古典范式为核心的主流经济学获得了更强的全球传播能力。在思想交流以外,这种扩散更借助大学课程、英文教材、核心期刊、科研资助体系、国际组织与政策咨询网络而完成制度化输出。^[34]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结束、新自由主义流行、华盛顿共识扩散,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影响力增强,个体理性、市场均衡与效率标准等分析范畴,被更广泛地表述为“普遍适用”的经济学语言,而发展改革中的规范与实践问题,也被更经常地视为资源配置与激励设计的技术问题。^[37]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无论新古典经济学在其主流表达中如何以去历史化、去制度化的形式语言呈现自身,它都无法摆脱这样一个事实,即它的理论生命力深植于特定的社会秩序和制度结构。新古典范式之所以能够在美国获得较强的解释力与操作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秩序、稳定的私人产权安排、专业化的技术官僚体制、高度量化的治理需求等。当该框架被进一步推广至历史路径、国家结构、发展阶段与制度逻辑都迥然不同的社会时,其解释力和适用性便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时具有深厚历史连续性与制度独特性的国家而言,如果直接套用以西方经验为隐含前提的新古典范式,往往难以把握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国家治理之间相互嵌合的复杂关系。

五、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与建设

1. 外来学说的引进、吸收与改造

在进入新时代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在不同历史阶段围绕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需要,引进和吸收国外经济学说,并联系中国实际加以改造。中国经济学基本上形成了一条“输入—适应—再调整”的知识演进路径。具体而言,晚清民国时期,主要是围绕“救亡图存”的社会转型需要,积极引介各类海外经济学说;新中国成立后,主要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中体系化吸收苏联政治经济学;改革开放后,则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重新引进、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不过,知识体系的变迁也反映出,何种外来经济学知识能够占据主导地位,一个关键因素就在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同时回应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实证、规范与实践问题。

中国的早期现代化探索是在列强入侵、经济殖民与国家治理危机交织的背景下开启的,经济学知识的引介与传播首先服务于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这一价值目标。^[38]对国外经济学的引进与学习并不必然意味着本土意识的丧失;恰恰相反,“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促使当时的国内学者在中外思想的碰撞中不断聚焦中国本土经济问题,并积极尝试从中国社会现实出发理解财政、金融、产业、贸易等关键议题。^{[39][40]}围绕着“经世济民”的现实关切,经济学逐渐成为理解现代经济制度、处理国际经贸往来、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推动社会秩序进步的重要工具。在同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播,为后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41]即便仅从当时几场著名的学术争论,如币制改革之争、农业国与工业国之争、中国社会性质之争等出发,也不难发现,这一阶段中国学者试图初步建构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其主要任务还是围绕“目标—道路”问题而展开的价值判断与制度选择,各种实证经济学的方法、理论与学说,则主要是为了服务于价值目标与经济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理论开始更直接地嵌入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与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在这一时期,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两个前后衔接的阶段:其一,是在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政策指导下,完成经济恢复并为社会主义制度转型奠定基础;其二,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后,重点吸收和学习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适应全国范围内工业化推进和统一经济管理的现实需要。^[42]毛泽东指出,之所以高度借鉴苏联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党虽然“积累了根据地管理经济的经验”,但“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43]¹¹⁷系统经验对应着系统性知识体系,所以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经典著作外,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度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与党校培训中的权威教材,承担了普及理论与培养干部的重要功能。^[44]

值得强调的是,即便是在体系化输入阶段,中国经济学的知识体系也始终蕴含“吸收—反思—再创造”的内在张力。毛泽东多次强调,对待苏联政治经济学要批判地学习而非教条式吸收,并明确提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43]¹⁰⁹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重要理论支柱,也在组织国家治理、统一价值目标、凝聚政治认同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换言之,经济解释、价值判断与治理实践被更有力地整合于同一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之中。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转型,过去借鉴自苏联的政治经济学不仅难以解释和指导这一深刻变革,更无力处理诸如价格稳定、资源配置、微观激励等新问题。于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决策推动下,西方经济学的相关概念、理论与政策工具开始更大规模地进入中国学术界与政策领域。我国经济学界通过成立西方经济学相关的研究学会、系统性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在高校开设相关课程等方式,大力推动理论引进与教学体系的改革。^[45]在产权制度、激励机制、治理结构等议题上,新制度经济学等理论工具因契合改革需要而受到重视,并被广泛用于政策设计与现实解释。^[46]在宏观管理领域,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在“巴山轮会议”以后逐步取代了传统苏联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基本范式也由此发生转换。^[47]

西方经济学在这一阶段之所以表现出较强的学术优势,主要在于它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较为一致的解释框架与技术工具。中国对西方经济学的吸收始终是围绕改革目标与制度需要展开的选择性借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国外特别是西方经济学,我们要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对其中反映资本主义制度属性、价值观念的内容,对其中具有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内容,不能照搬照抄。”^[48]¹⁰⁵但在这一过程中,以新古典范式为核心的主流分析框架在经济学教学、研究训练和学术评价中一度建立起制度性优势,并由此强化了形式化模型解释、计量因果识别和技术化政策分析的研究取向。^[49]相较而言,规范判断与实践导向在理论优位和技术话语中则更容易被压缩,从而在知识体系内部积累起新的张力。

总的来说,中国经济学在新时代以前的发展,并非对外来理论的被动追随或简单移植,而是在不同现代化阶段,围绕国家任务、制度选择与治理需要,对国外经济学说的选择性引进、批判性吸收和本土化改造。苏联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都曾在特定历史阶段为中国经济实践提供重要的解释资源与政策工具,但它们毕竟植根于不同的制度背景和历史条件,其理论前提和适用范围与中国的具体实际并不完全契合,也难以在更复杂的新发展阶段同时回应机制解释、价值判断与治理实践的综合要求。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更高层次的新阶段,单靠对既有理论的工具性吸收,已越来越难以满足现实需要,其局限性也日益显现。这为新时代以后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历史前提。

2. 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特别是以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为标志,构建中国特

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快形成自主知识体系被明确提升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战略任务,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也由此开启了新阶段。^[3]对经济学而言,这不仅意味着政策层面对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更表明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在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为中国经济学摆脱长期以来以“引进—吸收—改造”为主的知识演进逻辑,进一步转向立足中国实践的自主建构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思想资源。

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认识上不断深化、在战略上不断成熟、在实践上不断丰富”^{[48]372},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也不断扩展与深化。在这一背景下,经济学知识生产的重点已不再局限于对增长、效率和市场化改革的解释,而是进一步转向对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国家治理、风险防控、绿色转型,以及新质生产力等重大问题的系统回应。由此,提出若干中国概念或理论已不足够,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所面临的重要任务,乃是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问题结构,重新组织实证解释、规范评价与治理实践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现实发展在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实证、规范与实践三个维度上都提出了更高、更综合的要求;仅仅依靠在某一维度增强创新,已难以应对整体任务。

在新的问题背景下,既有范式的局限也日益显露出来。无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具体分析工具上的相对不足,还是新古典经济学在处理制度复杂性、历史连续性和国家治理问题上的局限,都越来越难以单独覆盖中国式现代化所要求的复杂问题结构。一方面,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外部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国内外经济互动方式与发展约束条件都在发生深刻变化。既有解释框架难以充分涵盖高质量发展、风险治理和结构转型中出现的新机制,既有评价标准也难以完整容纳共同富裕、安全发展和绿色转型等新目标,而既有政策工具在面对平台经济治理、产业链韧性、区域协调和宏观政策协同等新治理情境时,同样暴露出适配性不足。由此,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任务,已经从借助现成理论解释中国,进一步转向构建一套更能解释中国、服务现实并参与世界对话的自主知识体系。

从现实的知识生产来看,这种自主探索已经在若干关键议题上具体展开。其一,宏观经济研究正日益凸显理论自觉,研究方向开始聚焦中国超大规模经济体运行特征、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关系,以及复杂政策目标之间的协同等主题,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总量平衡、短期波动或单一政策工具,而更强调高质量发展、风险防控、政策协同与长期稳定之间的系统关系;^[50]其二,在共同富裕、绿色转型、区域协调发展等议题方面,相关研究越来越少用单一效率标准评估发展成效,而是尝试将公平、安全、可持续性和制度可执行性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51][52]}其三,在新质生产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平台经济治理等新议题方面,研究者开始从中国实践中提炼新的概念装置和分析对象,将技术进步、制度条件、国家战略与社会目标共同纳入理论视野。^[53-55]这些探索表明,中国经济学已经明显超出单纯引进、吸收与改造现成理论的阶段,而开始从中国实践中提炼问题、组织概念并形成新的分析框架。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为上述探索提供了能够贯通机制解释、价值判断与治理实践的总体性思想资源与根本遵循。在知识体系建构的意义上,它推动了中国经济学重新组织机制解释、价值判断与治理实践之间的关系。新时代中国经济学自主探索的重要特征,集中体现为知识体系本身的结构变化,即实证分析不再只是对变量关系的抽象建模,规范判断不再被简单化约为前提或后置为口号,治理实践也不再只是理论的末端应用,而开始成为提出问题、校准概念和推动理论更新的重要来源。

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既是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标志,也是中国经济学由适应性发展迈向自主性建构的关键节点。对于中国经济学而言,真正的自主知识体系,并不意味着拒绝国际学术资源,更不意味着故步自封、闭门造车,而是在开放对话的前提下,以中国问题、中国实践和中国制

度逻辑为基础,逐步形成更具解释力与生命力的概念体系、分析框架和评价标准。其关键在于让实证分析能够真正触及中国经济运行的深层机制,让规范判断能够清晰地表达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目标,让治理实践能够推动实证与规范之间形成持续的正向反馈与有益转化。

六、结 论

从学科史角度看,经济学始终是一种兼具实证、规范与实践的复合性知识形态,而不是由纯理论构成的封闭知识系统。无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对商业社会秩序的整体把握,还是新古典经济学在形式化过程中对规范与实践维度的压缩,抑或中国经济学在现代化进程中经历的“引进—吸收—改造”与自主建构,都表明经济学知识体系的生成与演变深植于特定社会的制度结构、历史条件与实践需求之中。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在于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现实问题,重新组织实证、规范与实践的关系。

第一,建构中国自主的实证经济学知识体系,应该在坚持科学性与开放性的前提下,把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实证经济学处理“是什么”的问题,关注经济运行中的因果关系和机制解释,强调分析严谨性、逻辑一致性和证据可靠性。对于中国经济学而言,这意味着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论,也要合理吸收国外经济理论中经过实践检验的有益成分。更重要的是,这种吸收必须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涌现的现实问题来展开,而不能停留在对现成模型和概念的套用。特别是像央地关系、地方竞争、数字化转型、国有企业治理、平台经济监管这类议题,都是在特定制度结构、发展阶段和治理逻辑中展开的本土性问题。只有将这些现实问题真正转化为理论问题,将中国经验上升为概念、命题和解释框架,中国实证经济学的建构才可能由工具性吸收走向原创性生成。

第二,建构中国自主的规范经济学知识体系,需要正视并自觉处理经济学中的价值问题。经济学并非可以脱离价值判断的抽象知识或数理科学,发展目标、制度优劣、政策得失本身就隐含着规范标准。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就在于它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目标,包括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48]480-485}这些目标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回应的价值前提。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规范维度,既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共同富裕、绿色发展、长期稳定等价值取向落实在制度设计与政策评估中,也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逻辑中的规范资源,进一步转化为经济学内部可讨论、可论证、可评价的理论内容。只有如此,经济学才不至于被狭隘地理解为纯粹的实证分析,也能够避免新古典范式将价值判断隐匿于技术语言之后所带来的局限。

第三,建构中国自主的实践经济学知识体系,关键在于将经济学重新置于经济社会运行与现代化建设的现实过程之中。实践经济学不能止步于理论应用的技术问题,而应当转向“如何去做”这一贯通实证与规范的综合性问题,即如何将机制解释和价值判断落实为可执行、可检验、可调整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方案。中国经济学的一个鲜明特点,就在于它始终与国家建设、制度改革和治理创新密切相连。从新民主主义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经济学自主建构取得的重要进展,往往是在广泛的政策探索、地方试点、制度调整和治理反馈中不断形成和修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就具有鲜明的实践特征,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也长期强调经世致用,这都表明实践不只是知识体系的末端,更是知识生成的重要来源。因此,建构中国经济学的实践维度,在继续发挥计量分析、经验识别和政策评估等现代方法优势的同时,也要避免将实践狭隘地压缩为技术评估或统计验证。更

重要的是,要通过制度运行和政策成效,不断检验和修正解释框架与价值目标,并在持续的反馈中提出新问题、塑造新概念、推动理论更新,使实践真正成为连接实证与规范的中介环节。

学科史与经济哲学的考察表明,经济学知识体系从来不是“实证在前、规范在外、实践在后”的线性结构,而是实证、规范与实践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不断重组、相互支撑并充满张力的知识整体。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发表以来,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任务更加清晰,即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将中国的实践成就、历史传统、制度逻辑与发展目标整合为系统性的理论表达。能够理解中国、服务现实并参与世界学术对话的中国经济学,需要形成一种更为稳定的知识结构——实证研究解释中国经济社会运行机制,规范分析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实践探索则在政策与制度层面持续反馈并反哺理论。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
- [2]郑栅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6.
- [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4]刘守英.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路径[J].经济学动态,2021(7):12-21.
- [5]杨典,向静林.中国经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标识性概念与关键议题[J].中国社会科学,2022(12):158-178+203.
- [6]习近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J].求是,2022(18):4-9.
- [7]孙圣民.经济学理论、实践与本土化——兼谈中国自主的经济学体系构建[J].经济研究,2023(12):185-202.
- [8]胡乐明,毛安琪.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基本特征[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5(4):3-12.
- [9]熊金武.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基础[J].学习与探索,2024(1):46-53.
- [10]Heilbroner R L. The Worldly Philosophers[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6.
- [11]Mirowski P. Physics and the “Marginalist Revolution”[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4(4): 361-379.
- [12]Hülsmann J G. Economic Science and Neoclassicism[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1999(4): 3-20.
- [13]O’Boyle B, McDonough T. Critical Realism, Marxism and the Critique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J]. Capital & Class, 2011(1): 3-22.
- [14]Ruiz - Villaverde A. Editor’s Introduction: the Growing Failure of the Neoclassical Paradigm in Economics[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2019, 78(1): 13-34.
- [15]张衡,庄志晖.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批评:一个理论述评[J].当代经济研究,2007(4):12-16+73.
- [16]宋胜洲.基于知识的演化经济学——对基于理性的主流经济学的挑战[J].经济学家,2007(3):9-16.
- [17]Lawson T. Economics and Reality[M]. London: Routledge, 1997.
- [18]Hausman D M. Realist Philosophy and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What is It? [J]. 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2000(1): 127-133.
- [19]贾根良.批判实在论:经济学方法论的新发展[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2):31-35+3-110.
- [20]顾海良.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思想精粹和学理跃升[J].当代经济研究,2026(1):5-9.
- [21]Keynes J N. The Scope and Method of Political Economy[M]. London: Macmillan & Co. , 1891.
- [22]Robbins L. 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M]. London: Macmillan, 1984.
- [23]多萝西·罗斯.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M].王楠,刘阳,吴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 [24]Hont I. Jealousy of Trad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the Nation Stat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M].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25]Jeck A. The Macrostructure of Adam Smith’s Theoretical System: a Reconstruction[J].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1994(3): 551-576.
- [26]Romani R. The Republican Foundations of Sismondi’s Nouveaux Principes d’économie Politique[J]. History of European I-

- deas, 2005(1): 17 - 33.
- [27] Nau H H. Gustav Schmoller's Historico - ethical Political Economy: Ethics,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the Younger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1860 - 1917[J].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2000(4): 507 - 531.
- [28] Commons, J R. Institutional Economic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31, 21(4): 648 - 657.
- [29] Chavance, B. John Commons's Organizational Theory of Institutions: a Discussion[J].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2012(1): 27 - 47.
- [30] Wagner P, Wittrock B. States, Institutions, and Discourse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the Structurat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s[M]//Wagner P, Wittrock B, Whitley R, eds. Discourses on society. Sociology of the Sciences Yearbook, vol 15. Dordrecht: Springer, 1990: 331 - 357.
- [31] Ekelund R B, Hébert R F. A History of Economic Theory and Method[M]. Long Grove, IL: Waveland Press, 2007.
- [32] Dopfer K. Toward a Theory of Economic Institutions: Synergy and Path Dependency[J].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1991(2): 535 - 550.
- [33] 张林. 从多元到新古典霸权: 20世纪上半叶经济学在美国的发展及其影响[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 [34] Fourcade M. Economists and Societies: Discipline and Profes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France, 1890s to 1990s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 [35] 任维伟, 李黎力. 凯恩斯革命: 一个论争史的考察[J]. 社会科学研究, 2025(2): 101 - 113.
- [36] 李井奎. IS - LM 模型: 一个经济思想史的考察[J]. 学术月刊, 2022(8): 45 - 54.
- [37] Backhouse R E. The Rise of Free Market Economics: Economists and the Role of the State Since 1970[J].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5(S1): 355 - 392.
- [38] 林毅夫, 胡书东. 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J]. 经济学(季刊), 2001(1): 3 - 18.
- [39] 王玲强. 生利分利说在近代中国的兴起——基于中西经济思想交汇视角的考察[J].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25(4): 180 - 194.
- [40] 程霖, 张申, 陈旭东. 中国经济学的探索: 一个历史考察[J]. 经济研究, 2020(9): 4 - 24.
- [41] 谈敏. 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启示[J]. 经济思想史学刊, 2021(1): 38 - 64.
- [42] 高德步. 从“照着讲”到“接着讲”到“自己讲”: 中国经济学的历史发展与当代人文构建[J]. 经济纵横, 2024(12): 1 - 11 + 137.
- [43] 毛泽东文集: 第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 [44] 王昉, 张宁. 新中国初期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探索——基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考察[J]. 政治经济学报, 2023(2): 73 - 94.
- [45] 杨春学. 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境遇: 一种历史的考察[J]. 经济学动态, 2019(10): 11 - 23.
- [46] 张林. 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运动: 新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一次触及灵魂的斗争[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06(1): 46 - 54.
- [47] 张琦. “巴山轮会议”与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范式转换[J].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21(6): 176 - 194.
- [48] 习近平经济文选: 第一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5.
- [49] Jia G. Reflections on Economics Education in China and Suggestions for its Reform[J]. Modern China, 2024, 50(1): 3 - 32.
- [50] 程霖, 岳翔宇, 夏艳秋. 宏观经济管理理论创新与中国式现代化: 标识性概念演进的视角[J]. 经济研究, 2023(1): 18 - 37.
- [51] 林淑君, 郭凯明, 龚六堂. 产业结构调整、要素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J]. 经济研究, 2022(7): 84 - 100.
- [52] 李建军, 李建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 科学内涵、制度保障和分配改革[J]. 当代经济研究, 2022(10): 35 - 42.
- [53] 高培勇, 杜创, 刘霞辉, 等.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一个逻辑框架[J]. 经济研究, 2019(4): 4 - 17.
- [54] 徐政, 郑霖豪, 程梦瑶. 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构想[J]. 当代经济研究, 2023(11): 51 - 58.
- [55] 洪银兴. 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J]. 当代经济研究, 2024(2): 7 - 9.

责任编辑: 王 辉